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24

从国家翻译能力框架看翻译教育跨文化能力培养

包佳鑫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 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 跨文化能力在翻译教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国家翻译能力的理论框架, 探讨了跨文化能力与国家意识及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之间的紧密联系, 指出跨文化能力是提升国家话语国际影响力的关键能力。当前我国翻译教育还存在语言技能强、文化认知较弱的现象, 亟需从“国家”高度出发, 完善跨文化能力培养体系。本文提出通过课程改革、教学方法创新和跨学科融合, 强化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国际传播能力, 促进翻译人才从语言转换者向文化传播者转变。为翻译教育的改革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路径, 助力构建符合国家需求的高素质翻译人才队伍。

关键词: 跨文化能力培养; 国家翻译能力; 国家意识; 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

一、引言

2000 年 10 月,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走出去”的战略理念, 随后在 2002 年, 时任文化部长孙家正进一步强调了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 指出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扩大对外文化交流; 2013 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讲好中国故事”, 强调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性, 进一步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全球化浪潮深入推进与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时代背景之下, 高等教育机构亟需将跨文化能力培养纳入核心育人体系。翻译教育更肩负着构建文明对话纽带、弥合文化认知鸿沟的时代重任, 翻译人才在扎实掌握语言转换的同时, 也需深入理解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 以期在文化差异中实现意义的等效传递。

中国翻译活动逐步从“翻译世界”走向“翻译中国”, 翻译的任务不仅要译进来, 还要译出去, 国家的译学话语中出现了“国家翻译行为”、“国家翻译规划”、“国家翻译能力”等词。这表明, 译学界开始认识和揭示翻译的“国家性”, 致力从国家建设的现实维度拓展翻译研究的理论视域。其中, “国家翻译能力”的提出具有特殊意义, 开启了对翻译能力作为国家能力的专门探索(蓝, 2021)。在国家翻译能力的理论建构中, 国家意识是国家翻译能力建设的逻辑起点; 国家翻译传播是国家翻译能力建构的现实旨归(杨, 2021)。国家意识是公民们通过对本国历史、民族特征以及文化传统的科学了解和认识所形成的认同感, 是经过理性思考后的实践, 意味着公民的行为不仅出于本能或者传统习惯, 而是基于对国家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一种自觉选择。国家翻译以国家意识构建国家话语、国家叙事和国家传播, 强调翻译与传播的深度融合, 囊括更深入的文化理解与传播智慧(陈, 黄, 2024)。

在国家翻译能力框架下, 跨文化能力作为连接语言转换与文化传播的核心要素, 其培养效能直接影响国家话语体系的全球建构。当前我国翻译教育呈现显著的“能力倒挂”现象: 学生普遍具备较强的语言转换技能, 而文化维度能力存在系统性缺失。国家翻译能力建设要求翻译教育突破语言技能训练的局限, 重视以国家意识为导向的跨文化能力培养体系, 强化国家文化认知,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实现翻译教育的全球化转型。

作者简介: 包佳鑫(1996—),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语笔译、外国语言文化。

二、跨文化能力

跨文化能力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效沟通和互动的能力，它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尤为重要。交际双方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差异对交际的顺利展开形成一定的阻力，这就要求交际双方在具备普通交际能力的基础上还应具备额外的能力，即“跨文化能力”，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容忍度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

跨文化能力是翻译能力的重要要素之一，被纳入翻译能力模型(Tomozeiu, Kumpulainen, 2016)。专业翻译人员在不同文化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中介，理解并适应文化差异，最终实现准确的翻译和交流。翻译活动中，具有跨文化能力的译者表现出高水平的跨文化知识、技能、态度和灵活性(Tomozeiu, Koskinen, D'Arcangelo, 2016)，这种能力不仅涉及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还包括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翻译的最终产物是能够在特定情况和使用语境中适当发挥作用的文本，翻译过程即“跨文化交流的过程”(Schäffner, 1996)。语用学视角的翻译理论将翻译视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其核心便是通过动态适应语境、传递意图和平衡文化差异，实现功能等效。

刘宓庆强调，翻译人员需具备双语能力、文化敏感度以及批判思维(2007)。而在今时之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能力更应纳入翻译工作的核心要求。一方面，深入理解文化差异帮助翻译人员准确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使译文既符合专业标准，又适应不同文化语境；另一方面，跨文化能力使得译者在国际交流中形成独特优势，有效解决多元文化场景中的理解障碍，提高沟通效率，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翻译教育要注重语言技能与文化认知的同步培养，使从业者既具备精准的语言转换能力，又能灵活调整文化差异，实现跨语言信息传递的真实性和实际传播效果。

三、国家翻译能力

任文等人认为，国家翻译能力属国家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定实施翻译相关规划和政策法规、掌控翻译相关资源、开展翻译实践、提供翻译服务、处理翻译问题、发布翻译产品、提升传播效果，并通过翻译教育与翻译研究、语种人才储备、技术产品研发等手段进一步发展翻译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包括翻译管理能力、翻译实践能力、翻译传播能力和翻译发展能力等四个子能力。开展翻译相关活动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机构，只要相关活动以某种方式体现了国家利益，就应被纳入考量(2021)。而杨枫认为，任文、李娟娟关于“国家翻译能力”的定义多有繁复，可简化如下：国家翻译能力以国家为主体或目的，指涉国家翻译规划、国家翻译教育、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技术和国家翻译传播等综合复杂的国家翻译行为能力(2021)。

其中，推进国家翻译能力建设不可忽略翻译研究中必须面对的国家意识。国家意识是公民基于对国家历史、文化、民族以及政治制度的科学认知而逐渐形成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体现于思想情感层面与理性实践，既包含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和形象的正确认识，也包括对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的认同，以及对国家责任和使命的自觉担当。这种意识强调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要求公民在认同国家的同时，履行相应的义务，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贡献力量。国家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通过教育、文化传承和社会实践不断深化，以实现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和谐统一。国家翻译能力的建构必须接受国家意识的约束，特别是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时，必须以几千年来积累的“治”道文化为核心，传播推广中国文化中体现的“治道精神”和经验，推动建立全球治理体系，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同时，翻译实践产生的产品要通过其传播效力才能体现其应有价值，具体包含翻译产品媒介能力、译入译出产品影响力和国内语言互译产品影响力。早在20世纪90年代，译介学便开始关注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媒介作用，尤其是文学翻译的传播、接受与文化影响，融合了比较文学、翻译学、传播学等多重视角。国家翻译传播能力突出翻译活动产品的公共性、接受性和影响力，对国家及其语言的声望和话语权有巨大影响，翻译实践类活动最终通过媒介传播能力、产品影响力等体现翻译产品的价值(任, 赵, 2023)。

总之，国家意识与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同属国家翻译的核心能力，是当下国家翻译能力框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国家意识与跨文化能力培养

翻译学本身的主体意识往往指的是学者个体的学术旨趣和学科的性质和学理结构,但却忽视了翻译研究中必须面对的国家意识。翻译学试图通过学科的理论建构和翻译实践实现国家特定跨语际和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目的,其天生的意识形态品格决定了其国家观念要远远大于其学科观念。

2022年,“上外”跨文化研究中心发布的《外语教育中的跨文化能力参考框架》中,首次将“情感态度”与“认知理解”和“行为技能”并列,作为“跨文化能力”的三大核心维度之一。“情感态度”这一维度涵盖了文化意识、国家认同和全球视野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意识强调学生应具备探索中外文化的兴趣,并能够敏锐感知和理解文化差异;国家认同旨在引导学生在接触外国文化的过程中,通过中外文化的比较与反思,深入理解并认同中国文化的价值,从而形成正确的身份认同;全球视野则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全球公民意识,为其未来参与全球治理奠定基础。这一框架的提出,为外语教育中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更加全面和系统的指导。

在国家翻译能力建设的框架下,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应高度重视国家意识的塑造。这一培养过程应以树立国家意识为核心出发点,要求翻译工作者首先坚定文化自信,再在此基础上深入关注中外语言、文化与话语体系的差异;同时,要从译文受众的角度出发,努力实现话语同步与话语等效的目标。具体而言,翻译教育中的跨文化能力培养应以扎实的汉语功底为根基,强化对中华文化叙事体系的系统性掌握。通过历史叙事、发展叙事与现实叙事的文化认知体系,帮助译者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核。通过对母语文化的深度把握,译者更能敏锐地识别出文化差异,从而实现话语等效的创造性转化。研究表明,母语文化素养与跨文化效能感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通过语言与文化的紧密结合能够显著提升译者对文化差异的认知能力(Duysabayeva, 2022)。以国家意识为导向的培养模式,不仅有助于提升译者的专业素养,实现在全球化语境中话语同步与等效的目标,也能为国家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有力支撑。

另外,目前的翻译教育评价体系仍多聚焦与语言转换效率与文本忠实度,虽在文化对比、政治术语处理等环节隐含国家意识元素,但缺乏系统性的显性指标。为此,翻译教育的跨文化能力培养需突破传统评价中文化维度的模糊性,重视建立双文化认知的评估机制,考察对本国文化核心符号系统与目标语文化语境知识的对称性掌握,包括两国的历史典故阐释、术语转换、价值隐喻再现等内容,可通过文化符号配对测验与跨文化语境判断进行量化。在培养过程中,必须强调源语文化内涵理解的准确性与目标语文化适配的合理性,可通过双向文化注释报告与平行文本对比分析报告进行考察;同时,针对文化调试能力,则需关注文化冲突识别的敏感度与文化信息重构策略的多样性,通过危机情境翻译模拟等进行考察。最终,实现将隐性文化认知转化为可观测量化的绩效评估体系,推动翻译能力评价从语言本位向文化赋能的方向转换。

五、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与跨文化能力培养

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是国家翻译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地位在新时代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中日益凸显(任, 赵, 2023)。这一能力以国家立场为基础,通过翻译实践将本国话语转化为国际受众可理解的内容,并借助有效传播媒介实现跨国界传递与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其功能已超越传统语言服务范畴,成为提升国家话语权、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支柱。当前,“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正是破解跨文化认知壁垒、实现价值共鸣的关键支撑。

翻译的本质是通过符号转换实现意义的跨文化再生,尽管翻译活动的主体、内容与媒介随时代演变不断拓展,但其核心始终围绕不同语言符号系统的转换与重构展开。这种转换不仅是语言表层的形式对应,更涉及文化内涵的深度阐释。当前我国翻译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结构性挑战。中译外领域高水平人才断层现象明显,部分译者缺乏国际传播意识,在实践中易被简化为“文字转换工具”,仍难承担文化阐释与价值传播的深层职能。

提升翻译传播效能需强化跨学科融合培养路径。翻译教育应打破单一语言训练的局限,通过传播学、国际关系学、传媒技术学等相关能力素养整合,实现文化认知、阐释与传播效能的系统性提升。传播学素养帮助译者把握受众认知框架,通过理论应用优化传播效果;国际关系知识助力解码复杂政治话语,降低

文化误读概率；深入应用多模态翻译技术，增强信息在不同媒介中的传播精度。跨学科融合培养模式能够系统提升译者的文化阐释能力，促使译者从被动转换者转变为主动传播者。

另外，翻译人才培养还需实施分类推进策略。针对非通用语种，需构建语言及其区域研究的特色课程，加强对目标语国家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的深度认知；在涉外法律、能源合作等专业领域，应深化行业话语的翻译训练。同时，通过国际交流项目、跨国实践平台等渠道，增加译者的跨文化实践经验，如提供国际会议协作翻译或海外文化项目机会，帮助译者直观理解文化差异，提升传播策略的应用与调整能力。采用以上分层分类的培养机制，可逐步缓解人才断层问题，为国家翻译能力建设提供可持续支撑。

六、结语

本文将国家翻译能力的理论框架首次系统引入翻译教育领域，为理解跨文化能力培养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分析国家意识、对外翻译传播能力与跨文化能力之间的关系可知，翻译教育不能仅停留在语言技能训练层面，而应转向培养文化解读与价值传播的综合能力。当翻译活动从个人行为升级为国家战略时，教育体系需要强化对国家文化内核的理解。国家翻译能力的视角为翻译教育打开了新思路，帮助教育者重新定位培养目标，也为政策制定者评估翻译教育成效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后续翻译教育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可从以下角度进行进一步探索：其一，国家翻译能力指标体系与跨文化能力测评工具的对接研究。当前国家翻译能力评估多侧重语种覆盖与翻译产量，未来需开发包含文化传播效度、价值传递准确度等维度的复合型评价工具。其二，数字技术赋能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机制研究。随着神经机器翻译技术的普及，如何构建人机协同的文化阐释模型，将成为翻译教育革新的关键课题。其三，非通用语种区域国别研究与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融合路径。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语境中，需探索特色化培养方案以应对复杂的地缘文化挑战。

翻译教育的本质是培养文明对话的使者。在国家翻译能力建设视域下，跨文化能力培养已超越单纯的教学改革范畴，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工程。唯有将国家意识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起语言能力与文化能力协同发展的新型育人体系，方能培育出深谙中华文化精髓、精通国际传播规律的新时代翻译人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 [1] 蓝红军.国家翻译能力的理论建构:价值与目标[J].中国翻译,2021,42(4):20-25.
- [2] 杨枫.国家翻译能力建构的国家意识与国家传播[J].中国翻译,2021,42(4):15-19.
- [3] 陈京钰,黄友义.构建国家对外话语体系中的对外翻译及国际传播—黄友义先生访谈录[J].中国翻译,2024,45(2):117-122.
- [4] TOMOZEIU D, KUMPULAINEN M. Operationalis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for translation pedagogy.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2016,10(3):268-284.
- [5] TOMOZEIU D, KOSKINEN K, D'ARCANGELO A. Teach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translator training.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2016,10(3):251-267.
- [6] 刘宓庆.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 [7] 任文,李娟娟.国家翻译能力研究:概念、要素、意义[J].中国翻译,2021,42(4):5-14+191.
- [8] 任文,赵田园.国家对外翻译传播能力研究: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上海翻译,2023,(2):1-7+95.
- [9] DUYSABAYEVA D. Formation of Linguo-Culturological Competence of Future Native Language Specialis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Review*,2022,5(4):97-101.

Cultivat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Translation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al Translation Capacity Framework

Bao Jiaxi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globally,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translation edu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ational translation capac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s between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capacity, and highlights its pivotal role in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a's discourse. Currently, translation education in China still exhibits a phenomenon of strong language skills coupled with relatively weak cultural cognition, urgently requiring the improvement of an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cultivation system from a national strategic perspective. This study proposes curriculum reform, pedagogical innov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o strength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from mere linguistic converters to cultural communicators. The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reform of translation education,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translation talent that aligns with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Keyword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cultivation; national translation capacity;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capacity